

◆ 王展祥魏琳<sup>1</sup>

Zhan-xiang Wang Lin Wei

## 结构优化过程中合意发展速度的识别与辨析：历程与评价

###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Desirable Pace of Development in th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Process: History and Evaluation

摘要：所有的结构特征都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理解，涵盖城乡、产业、区域、投资等内容。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并从各方面作用于需求、供给及供求结构，进而最终影响合意发展速度。与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经济结构特征决定了该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漫长的前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速微乎其微；快速的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速和结构变化一样迅速而持久；后工业化阶段，供求的不匹配及其动态调适使得合意发展速度下降并充满变数。新中国成立以来 60 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亦表明，凡有利于结构红利释放的发展阶段及结构变化过程，将提高合意发展速度。在今后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我国可能将进入合意增长率下降的结构性减速发展阶段，但是新的结构红利效应潜力依然巨大，适时而前瞻性经济政策的引导、尊重“看不见的手”原理显得尤为关键和迫切。

关键词：结构变化，工业化，合意发展速度，结构红利，发展阶段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结构优化不是一个新问题，已提出并实践了三十多年，依然没有解决甚至恶化，体现为持续多年近 10% 高速增长以后，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物质积累已达到一定高度，许多行业生产严重过剩；同时 2012 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也似乎进入持续下降通道。种种迹象表明，基于廉价要素和结构红利的传统高速增长，即将跨入系统性减速阶段。十八大报告中提出

---

<sup>1</sup>作者简介：王展祥，江西财经大学副研究员，当代财经杂志社副社长，邮政编码 330013，电子邮箱：cfe08@126.com。

基金资助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与中国产业发展路径研究”（10BJL0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过剩条件下促进经济适度发展的结构优化理论与对策研究”（13CJL015）；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去工业化、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结构优化”（10YJC790268）。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前者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年均 7.2% 的增长率，考虑人口增长因素后者隐含的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可能更高。依靠创新驱动的适度合理发展是迎接所有挑战的关键，更关乎两个“翻一番”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在此，对结构优化过程中的合意发展速度问题进行解析就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 一、引言及相关文献评述

从理论渊源上讲，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指出，较之农业，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更高，因为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凡是采用分工制，便能相应增加劳动生产率。这意味着，基于分工原理的劳动力部门配置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两大部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平均利润率理论，指出了经济部门之间动态变化的动力，及保持适当比例的必要性。这成为以后该领域研究的两大理论奠基。

二战以来有关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大致可分为两个流派。

一是主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结构变化只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附属产品。这类文献中，储蓄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学习效应、政府行为等因素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并强调增长率的递减与趋同（Solow, 1956; Cass, 1965; Lucas, 1988; Romer, 1986, 1990; Laitner, 2000），结构体现在生产函数差异及异质性偏好上，而以部门间要素和产出份额度量的结构变化不是被有意忽视就是被无意遗忘。

二是非主流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认为结构变化会影响经济增长，又分为两种观点。

（1）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Lewis（1954）的二元结构理论开此先河，Kuznets（1957, 1985 年中文版）、Chenery（1960）等强调了结构变化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Maddison（1987）则把结构变化视为经济增长的最核心要素，Lucas（1993）从供给角度论证结构变化对生产率进而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Timmer 和 Szirmai（2000）把结构变化的重要作用概括为“结构红利假说”并广为引用。针对中国，多数学者研究认为，与世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以及劳动力的城乡再配置是导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Hsieh 和 Klenow, 2009; Ehmer, 2011; 世界银行等, 2012）。

（2）结构变化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及整体经济增长。这种观点认为，发达国家以制造业份额下降而服务业份额上升体现的结构变化（或去工业化），降低了社会整体生产率（Baumol, 1967），减少了就业机会和税收，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Krugman, 1996; Hersh 和 Weller, 2003; Rowthorn, 2010）。当然，对此观点也有文献存疑（Nicholas, 1996; Rowthorn 和 Ramaswamy, 1997）。

国内对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致与改革开放同步进行，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理论研究。早期强调结构变化尤其是产业结构变化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及机理，如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结构关联效应、结构偏差制约、结构性加速等（马洪和孙尚清, 1981; 杨治,

1985；周振华，1995；郭克莎，2001；刘霞辉，2003）；也有基于数理方法论证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陈晓光和龚六堂，2005）；近年来又开始强调结构效应的衰减（陈东升，2011；袁志刚和余宇新，2012）；马建堂（2013）提出了结构优化的适度增长问题，大致在 7% 至 8%，主要限于经验预判，没有进行系统论证。

二是实证研究。多采用宏观数据进行回归处理，有支持结构变化单向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刘志彪，2002；周英章和蒋振声，2002），也有强调二者之间累积性、双向循环的长期协整关系（钟学义和王丽，1997；吕铁和周叔莲，1999）。刘伟和李绍荣（2002，2005）较早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去工业化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还有基于统计分析指出，二者关系无统一范式，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巴曙松和杨现领，2011）。

纵观上述研究有几个特点：（1）重视工业取代农业占主导地位（工业化）的结构升级，相对忽视服务业取代工业占主导地位（去工业化）的结构变迁，以及两种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比较；（2）侧重供给视角经济结构对生产率及经济增长的影响，鲜有文献基于供给与需求二分角度系统论述结构变化与发展速度的内在关联；（3）研究重点多集中在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方面，普遍忽略经济发展速度与结构优化关系的系统研究。值得提出的是，马洪和孙尚清在 30 多年前就提出片面追求高速度导致产业政策偏离和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刻远见，在过剩与发展减速阶段该思想显得尤为深邃，为本研究提供启迪。

论文拟运用供求两分法界定经济结构新内涵，兼容并蓄多种理论以揭示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与经济合意发展速度三者之间的深刻关联和内在影响，构建涵盖工业化与去工业化、内容更为充实完备的结构问题一般分析框架，对于丰富传统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等有积极促进意义，对于到 2020 年实现两个“翻一番”宏伟目标有实践指导意义。

## 二、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变化特征

有关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有很多，结构特征是区别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根据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结构特征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结构方面；在产业经济学家看来，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结构是其主要的分析对象；而需求结构和投资结构又是标准宏观经济学所强调的核心内容。可见，不同学科、不同理论认识经济结构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里根据研究需要，以工业化为主线，借鉴多学科相关理论，从供求结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互动关系视角，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厘清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变化特征，为后面分析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奠定基础。

一个经济体在由贫穷落后到富裕先进的发展过程中，不严格意义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去工业化阶段。以工业化为主线作此区别，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1）工业化是理解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钥匙，落后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断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张培刚在 20 世

纪 40 年代就提出了这一论断。立足于发展中国家以工业化为主线对其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符合历史和现实。

(2) 工业化与产业结构紧密相连，以工业化为主线能较好地把与结构变化有关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兼容并蓄地关联起来，便于以发达国家既有历史为参照系，对比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例如，李斯特的五阶段论，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时期和农工商时期，这明显是以主导产业为依据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而托夫勒的三次浪潮论，即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换句话说就是农业、工业和信息产业阶段；胡佛和费雪的标准阶段次序，也是典型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划分视角。以工业化为主线进行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则已有相关经济发展阶段理论都可以从经济结构的角度进行串联起来，并借以利用和发挥。

(3) 工业化是连接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速度的桥梁和枢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结构特征，而不同的经济结构特征又在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影响着经济发展速度。农业阶段，技术落后，资本稀缺，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极其低下，供给能力与需求水平的长期低水平徘徊，决定了其长久缓慢的经济发展速度。工业阶段，资本积累日益增多，大规模批量生产的技术水平越来越先进，生产率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强劲的需求和持续的供给相结合，共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因此，以工业化为主线能较好地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把经济发展阶段、结构变化和发展速度关联起来。

此外，丹尼尔·贝尔从更为宏大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并主要基于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进行了阶段分析。而我们主要是基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视角，从经济结构角度来做此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去工业化经济发展三阶段的区分，并试图探讨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变化及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当然，丹尼尔·贝尔的三阶段论为我们阶段划分提供了直接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接下来我们主要从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投资结构等方面来逐一分析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去工业化阶段的结构变化基本特征。

前工业化阶段是一个第一产业占主导的漫长的经济发展时期，大致相当于李斯特五阶段论中的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罗斯托六阶段论中的传统社会及起飞准备阶段，以及胡佛和费雪“标准阶段次序”中的自给自足经济、乡村工业兴起及农业生产结构转移阶段。这一阶段，一国或地区经济活动基本随自然资源而分布，产业结构单一，农业是最主要的产业。农业人口占据主导，市场和劳动力都主要限于农村。技术水平和生产率低下，人们以温饱求生为目标，衣食是人们最主要的需求，资本积累有限，区域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为资源禀赋的差异。到前工业化晚期，家庭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发展起来，各种以逐利为目标的商业组织普遍出现，产业结构呈多元化趋势。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生产水平有所提高，生产率大为提高，人口增加，在劳动分工、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的基础上，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逐步显现一定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人们向往追求高水平生活，

储蓄意愿开始增强。随区域贸易扩大，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更多地需要由政府来承担。在欧洲可以简单视蒸汽机发明之前的历史为前工业化阶段。

工业化阶段是一个第二产业逐渐占主导的相对较快的经济发展时期，大致相当于李斯特五阶段论中的农工时期，罗斯托六阶段论中的起飞与成熟阶段，以及胡佛和费雪“标准阶段次序”中的工业化阶段。在配第一克拉克定理的作用下，人们将更多从事工业生产活动以获取更高的收入。工业内部也遵循迂回生产效率更高的原则，从家庭手工业开始逐渐扩大到机器制造、化工、汽车等重化工业。机器生产开始代替手工劳动。劳动力也遵循比较收益原则，在城乡和区域之间进行再配置，进而在产值、就业、税收等方面不断影响城乡及区域经济结构的平衡性。随着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不断地由吃、穿等低层次需求日益向住、用、行、乐等高层次需求升级，这将进一步成为创造供给的源泉。随着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发展，各种富有创新和活力的企业组织形式与各种商业业态开始出现，私人资本越来越雄厚，在社会总投资中政府由主角逐渐成为私人投资的补充。按照罗斯托的推算，各国进入工业化的大致年代是，英国为 1783—1802 年、法国为 1830—1860 年、美国为 1843—1860 年、德国为 1850—1873 年、瑞典为 1868—1890 年、日本为 1878—1900 年、俄国为 1890—1914 年。（罗斯托，2001 年，第 46 页）

去工业化阶段是一个第三产业占主导的相对较平稳的经济发展阶段，大致相当于李斯特五阶段论中的农工商时期，罗斯托六阶段论中的高额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以及胡佛和费雪“标准阶段次序”中的服务业阶段。这一阶段，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体现为服务业就业与产值份额的绝对优势。这一阶段，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极大提高，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改变，消费者需求层次和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由耐用品消费不断向教育、休闲、环境等升级。城镇化比例很高，城乡差距已不再重要，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性伴随服务业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存在。在要素收入中，人力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因其在服务业中的更加稀缺而获得更高的收入，收入差距中行业及要素之间的收入差距或许较为突出。随技术进步、交通发展及制度完善，交易成本减少，各种要素逐渐从一国内部配置向国家之间及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优配置。技术和专业性服务成为主要的贸易对象。随着经济结构及运行方式的变化，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并存可能成为经济的发展模式。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美等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逐步迈入这一阶段。

### 三、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与规律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结构特征，并从不同角度和程度上作用于需求、供给及供求结构，进而最终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基于此逻辑，前面我们论述了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结构特征之间的关系，这里着重探讨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然后试图揭示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特征与经济发展速度三者之间的某种规律。

度量经济增长速度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总产出指标，二是人均产出指标。总产出指标如 GDP、GNP 等，人均产出指标有人均 GDP（GNP）、劳均 GDP（GNP）、单位时间人均 GDP（GNP）、单

位时间劳均 GDP (GNP) 等。不同指标有不同意义上的侧重，人均产出指标更具有福利的意义。如果总产出在增加，但人口增加的更快，则意味着人均产出在下降。同理，在人口增加的过程中，如果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则劳均产出也有可能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趋于下降。从一般均衡意义上讲，总产出指标与人均产出指标是一致的。所以，对经济发展速度相关数据的运用和认识，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限于数据的获得，现实中总产出指标往往运用的更多。

尽管很难获取前工业化阶段相关发展速度的数据，但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从罗马帝国衰败到 1500 年左右，欧洲的人均产出基本上没有增加，因为绝大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且技术进步很小，即便有产出的增加，也被相应增加的人口所抵消。1500—1700 年，欧洲人均产出开始为正，大约每年为 0.1%；1700—1820 年每年上升到 0.2%。（布兰查德，2010，第 204-205 页）从表 1 可知，西欧、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在 0—1000 年间，GDP 增长率不超过 0.1%，人均 GDP 增长率几乎为零；1000—1820 年，相应其 GDP 年均增长率也仅为 0.2%~0.3%，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更低。1000—1820 年世界 GDP 和人均 GDP 增长率分别为 0.22% 和 0.05%，按照这个速度，GDP 和人均 GDP 分别翻番所需的年数大致为 320 年和 1400 年，也就是说，在人均意义上讲，1000—1820 年，世界人均 GDP 都没有翻番。可见，在前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非常缓慢。

表 1 世界和主要地区 GDP 及人均 GDP 增长率：0—1998

	年份	西欧	日本	拉丁美洲	东欧和前苏联	亚洲（不含日本）	非洲	世界
GDP 增长率	0—1000	-0.01	0.10	0.07	0.05	0.00	0.07	0.01
	1000—1820	0.34	0.23	0.14	0.29	0.20	0.10	0.22
	1820—1998	2.13	2.75	3.05	1.92	1.84	1.99	2.21
	1000—1500	0.30	0.18	0.09	0.20	0.13	0.06	0.15
	1500—1820	0.41	0.31	0.21	0.44	0.29	0.16	0.32
	1820—1870	1.65	0.41	1.37	1.52	0.03	0.52	0.93
	1870—1913	2.10	2.44	3.48	2.37	0.94	1.40	2.11
	1913—1950	1.19	2.21	3.43	1.84	0.90	2.69	1.85
	1950—1973	4.81	9.29	5.33	4.84	5.18	4.45	4.91
1973—1998	2.11	2.97	3.02	-0.56	5.46	2.74	3.01	
人均 GDP 增长率	0—1000	-0.01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1820	0.14	0.06	0.06	0.06	0.03	0.00	0.05
	1820—1998	1.51	1.93	1.22	1.06	0.92	0.67	1.21
	1000—1500	0.13	0.03	0.01	0.04	0.05	-0.01	0.05
	1500—1820	0.15	0.09	0.15	0.10	0.00	0.01	0.05

	1820—1870	0.95	0.19	0.10	0.64	-0.11	0.12	0.53
	1870—1913	1.32	1.48	1.81	1.15	0.38	0.64	1.30
	1913—1950	0.76	0.89	1.42	1.50	-0.02	1.02	0.91
	1950—1973	4.08	8.05	2.52	3.49	2.92	2.07	2.93
	1973—1998	1.78	2.34	0.99	-1.10	3.54	0.01	1.33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 世界经济千年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3年，第16、116页。

工业化阶段是一个经济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如果说前工业化阶段，生产率低，储蓄和资本积累有限，供给长期不足，在此情况下人口及由此导致的需求长期超过供给，萨伊定律发挥作用，供给成了促进经济缓慢发展的主要动力；则在工业化阶段，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极大提高，储蓄和投资增强，充足的供给和旺盛的需求成了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双动力。大致从1870年开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入到工业化阶段（英国步入的时间更早），也由此拉开了各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序幕。从表1可以看出，1870—1913年开始步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速在明显提高，拉丁美洲GDP年均增长率高达3.48%，紧随其后的日本为2.44%。按照这一速度，拉美和日本实现其GDP翻番只分别需要20年和28年左右。世界经济在整个工业化浪潮的带动下也开始勃兴，由过去半个世纪GDP年均不到1%的增速迅速提高到1870—1913年的2.11%，实现GDP翻番大致需要33年，几乎为1000—1820年GDP翻番所需320年的十分之一。即便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工业化国家GDP的增速也只是稍微下降。1950—1973年，GDP增速迅速回升从来没有过的5%左右。从人均GDP来看，亦表现出和GDP同样的规律。可见，无论是从GDP角度还是人均GDP角度，相对于长期缓慢的前工业化阶段而言，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国家都经历了一个非常快速的经济发展时期。

去工业化较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主要体现为第二产业的日渐衰微，第三产业的迅速扩大。在当时这给英国的就业和外贸带来了很大负面影响，也给美国去工业化地区带来了税收减少、就业机会减少、劳动力外迁等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英、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劳动生产率也出现明显的下降，这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表现得更加明显。1970—1975年，美国每个劳工的年总产值的平均增长率为1.8%，英国为3.0%，低于两国1950—1975年的年均2.9%和3.4%的水平，也显著低于同期去工业化趋势还不明显的日本（5.4%）、意大利（6.0%）、西德（5.4%）和法国（3.4%）（丁溪，2006，第280页）。由于去工业化最初往往与基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息息相关，这给其产业承接国和地区带来了机会。因此，与英、美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承接英、美产业转移的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获得快速发展。1973—1998年，亚洲GDP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高达5.46%和3.54%，远高于同期世界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这似乎从横向角度间接说明，去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速度有可能会低于工业化阶段。而且，去工业化阶段的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波动越来越频繁，不确定因素也越来越多。从近年来的美国危机可见一斑。

大致可知，从一个历史长河角度看，前工业化阶段历史漫长而经济发展缓慢，工业化阶段相对短暂而发展较快，去工业化阶段尚未普及但其发展下滑趋势且波动与不确定因素增加的端倪可见。究其原因，以为在于不同发展阶段结构性特征的差异。前工业化阶段，技术水平与生产率极为低下，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稀缺要素，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以生存为目标，储蓄和资本积累非常有限，供给是短边，这决定了其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

而在工业化阶段，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从需求结构来看，外需往往扮演着比内需更重要的角色，投资作用日显，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更离不开政府，这决定了工业化阶段需求更加广阔而且潜力巨大。从供给结构来看，随着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以及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为工业发展做出了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张培刚）；与此同时城镇化发展迅速，城乡差距在扩大，建立在廉价资源基础上的低水平供给能力有极大的提高。旺盛的需求和充足的供给能力相结合促进了此阶段经济快速发展。

去工业化阶段，技术更为先进，生产率更高，第三产业占主导，由于各国经济都相对较之过去更为发达，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内需和外需都显得更为重要；由于生产率及收入的极大提高，私人和社会的储蓄与资本积累雄厚，私人投资占主导，需求不断升级，由工业化阶段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产品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转移，需求潜力依然巨大，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更为和谐。从供给结构看，人力资本将取代一般劳动力在生产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环境与生态压力剧增的背景下，各种资源日益稀缺，集约型发展方式将取代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农业成了需要受保护的弱质产业。与更高层次的需求相适应的高水平供给能力相对不足。这种供求的不匹配及其不断调适将不断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并增加了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具体发展阶段、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速度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和逻辑见表2。

**表2** 经济发展阶段、结构变化特征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内在机理

结构变化 发展阶段	需求结构	供给结构
前工业化 缓慢增长 自然型发展	以基本生存需求为主 消费第一，投资与出口有限 以生活必需品为主	生产技术与生产率低下 劳动力是瓶颈稀缺要素 农业为主且农产品供给不足
工业化 高速增长 粗放型发展	重外需轻内需，重投资出口轻消费 政府投资需求占主导 低技术含量及附加值产品需求为主	无限劳动供给与人力资源优势 廉价资源与低水平供给 农业支持工业，城乡差距扩大
去工业化 适度增长 集约型发展	内需首位，重质量轻数量，重消费 私人投资需求占主导 高技术含量及附加值产品需求为主	劳动供给短缺与人力资本优势 生态环境恶化与高水平供给 工业反哺农业，城乡差距缩小

前工业化阶段时间太长、去工业化阶段时间又相对过于短暂，以至于对其经济增长特征与规律分析主要都限于演绎和抽象；而工业化阶段正好位于这二者之间，对其做进一步分析显得必要。从

人均 GDP 角度看，按照库兹涅茨的研究，英国步入工业化的时间为 1765—1785 年，美国为 1834—1843 年，<sup>1</sup>当时英、美人均 GDP 为 227 美元和 474 美元。按照英、美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步入去工业化阶段算起，当时人均 GDP 分别为 1870 美元和 3580 美元。<sup>2</sup>如此，英、美在其大致 200 年和 130 年的工业化阶段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06% 和 1.57%。<sup>3</sup>在一个长达 100—200 年的时间里，年人均 GDP 增长率为 1%~2%，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快的增长速度。

从产值与就业份额角度看，英国在 1801/11<sup>4</sup>年农业产值和劳动力份额分别为 34.1%、34.4%，工业产值和劳动力份额分别为 22.1%、30.0%；到 1963/67 年英国农业与工业产值份额为 3.4%、54.6%，1961 年英国农业和工业劳动力份额分别为 3.7%、55.0%。美国 1839 年农业产值与劳动力份额分别为 42.6%、64.3%，工业产值与劳动力份额分别为 25.8%、16.2%；到 1963/67 年美国农业和工业产值份额分别为 3.3%、43.5%，1965 年美国农业和工业劳动力份额分别为 5.7%、38%。概略可知，在整个工业化阶段，美国农业产值与劳动力份额大致分别下降了 40 和 55 个百分点，而工业产值和劳动力份额大致提高了 20 个百分点；英国农业产值与劳动力份额则大致下降了 30 多个百分点，对应工业产值与劳动力份额增加了 30 多个百分点。后进入工业化阶段的美国较之经历更长工业化时期的英国而言，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农结构的急剧调整，这反过来意味着美国工业化阶段结构调整的更为迅速，而经济发展速度也更快，这与我们前面的逻辑分析与事实依据相一致。

#### 四、结构变化与合意发展速度：基于中国的考察

合意发展速度，是增长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也叫合意增长率或有保证的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自然增长率相对应，主要是指在储蓄和资本—产出比率为已知的条件下，要把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所需要的增长率，等于合意的储蓄率除以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随着计量方法研究的进步，在理论上可以对其进行度量，也有许多关于中国合意增长率的研究文献。这里，主要是借用合意增长率这一概念，对其进行侧重经济结构方面的理解，认为有利于结构优化或者说和经济结构优化相一致的经济发展速度就是合意发展速度。

凡是经济结构在快速变化的阶段，与之相应的经济发展速度就快；反之，经济结构变化缓慢，与之相对应的合意发展速度就低。在前工业化阶段，经济结构变化缓慢，合意发展速度一直很低；在工业化阶段，经济结构变化迅速，合意增长率就会偏高一些。当然，在工业化阶段中的不同时期，合意增长率也会有不同的表现。这里主要结合中国六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探讨结构变化与合意发展速度之间的规律性在中国是否存在，表现是否有异同。

对 6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对于我们所探讨的主题是必要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

---

1 这与罗斯托的研究稍有差异，但大致相同。

2 此段相关数据无特殊说明，均来自西蒙·库兹涅茨. 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27—28、151—154、264—267。

3 为便于数据的一致性和比较，这里取英、美 1965 年人均 GDP 数据，英国工业化时间按照 200 年计算，美国按照 130 年计算。

4 英国 1765—1785 年的各产业产值与劳动力份额数据就笔者手上资料尚不可得。

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不同的区分，<sup>1</sup>这里主要从结构变化和发展速度方面做一区分，并试图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一般关系。

从图 1 可以看出，无论是 GDP 增长率，还是人均 GDP 或劳均 GDP 增长率都呈现基本一致的变化规律和趋势。以增长速度和经济波动为主，兼顾考虑期间我国实际面临的经济与制度条件制约因素，以及其他学者（任保平，2010）的分类方法，我们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1952—1976 年。这一阶段为计划经济时代，是中国工业化的全面启动时期，经济增速缓慢，伴随经济频繁波动，经济结构变化也出现波动及滞后现象。（2）1976—2000 年。该阶段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也是工业化战略发生转变的阶段，经济波动周期相对较长，波动频率较慢，结构变化迅速，经济增速稳定而较快。（3）2000 年至今。由此开始中国加入 WTO，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加速发展时期，结构变化相对平稳。下面分阶段对其经济结构特征与经济发展速度进行概要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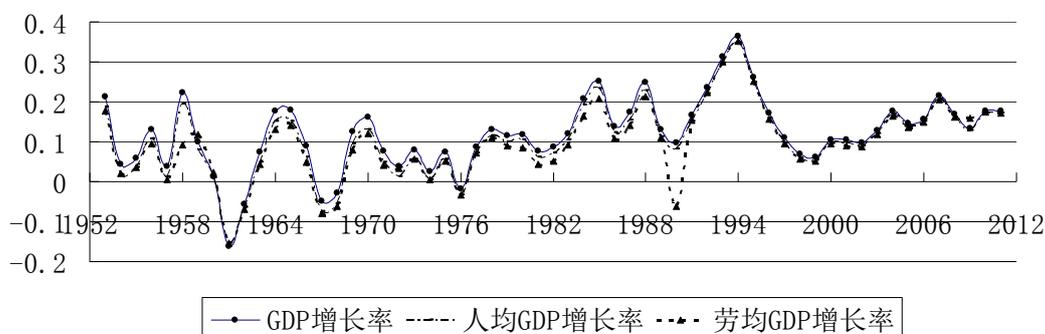


图 1 1952-2011 年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

注：1952—2008 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1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网站。

1952—1976 年是计划经济时期，这一阶段我国奉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违背比较优势原理的工业化战略，主要靠国家强力来启动工业化进程。1952 年人均 GDP 为 119 元，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份额分别为 50.95% 和 83.54%，到 1976 年，这三个指标分别为 318 元、32.9% 和 75.8%。按照钱纳里等农业产值与就业份额标准看，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化水平很低，属于人均 GDP 低于 100 美元的起步阶段；即便到 1976 年，工业化水平依然较低，不超过人均 GDP 200 美元的水平。但是，在政府主导型工业化模式下，依靠重工业导向的投资驱动，外加资源配置的计划体制和日益分割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全面启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的持续缓慢发展（见表 3）。当然，由于政府主导型重工业化模式内生出资源配置计划化、劳动力的城乡分割、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以供给为主忽视需求等结构性不平衡，导致在开启工业化进程之初就留下来农业就业份额严重滞后于产值份额等弊端。

表 3 1952—2011 年各指标分阶段增长率

年份	GDP 增长率 (%)	人均 GDP 增长率 (%)	劳均 GDP 增长率 (%)
----	-------------	----------------	----------------

<sup>1</sup> 详见一篇有益的综述文献：梁炜，任保平.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价及现阶段的特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4)：4—18，44.

1952—1976	6.3	4.2	3.6
1976—2000	15.8	14.1	20.1
2000—2011	15.3	15.0	14.6
1952—2011	11.7	10.1	9.3

注：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1976—2000 年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也是工业化战略悄然转变、结构变化迅速、经济发展较快的工业化推进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由重工业优先发展向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轻重工业之间、三次产业之间协调发展转变。市场因素也开始引入进来，成为与计划并行的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之一。传统计划体制下以政府投资为主、忽视需求、城乡差距扩大等经济结构不协调而体现的工业化模式，正在向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兼有、供给和需求并重、城乡差距缩小、社会经济和谐等结构优化而体现的工业化模式过渡。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结构变化迅速，且遵循一般经济结构演化规律。在第二阶段（24 年），人均 GDP 由 318 元提高到 7858 元，提高了 24.7 倍，而第一阶段（24 年）只提高了 2.7 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了 26 个百分点，比第一阶段下降的 8 个百分点多了 18 个百分点；第一产业产值份额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与第一个阶段持平。第二产业产值份额仅提高不到 1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份额提高了 8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产值与就业份额分别提高了 17 和 18 个百分点，而在第一阶段第三产业产值份额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是下降了 6 个百分点，就业份额只提高 0.6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第二阶段第二产业劳动吸纳能力更强，第三产业发展迅猛，这一方面符合我国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另一方面与我国工业化战略转变相一致。此外，因为市场因素的作用，私人投资也开始增加，国外投资也开始引入，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农村也适度开放，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民流动性增强，城乡二元差距呈缩小态势；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旺盛。这一良性且快速的结构调整与优化，极大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GDP、人均 GDP 和劳均 GDP 在这一阶段的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 15.8%、14.1% 和 20.1%，较之第一阶段分别高出 9.5、9.9 和 16.5 个百分点，实属奇迹。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由此掀开新的篇章，中国工业化开始进入逐渐成熟乃至向高级工业化阶段迈进和持续稳定增长阶段。中国人均 GDP 由 2000 年的 7858 元提高到 2011 年的 35181 元，即大致由 800 美元提高到 5000 美元。按照钱纳里的标准，人均 GDP 为 1000 美元至 3000 美元是工业化由中级向高级过渡的加速发展阶段，也是经济结构急剧发生变化的阶段。从需求看，随着 WTO 的加入，外围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繁荣以及人民币的低估，国际市场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外需空前高涨，内需相对不足。从投资看，前期工业化发展成果使得政府和私人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外需的刺激下投资动机强劲。由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重型制造业的逐步展开，这决定了政府投资扮演更为重要的作用。从城乡和区域结构看，伴随政府大量投资以及强劲的外需，劳动力加剧从农村和农业向城市和工业流动，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依然巨大。从经济增速看，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波动相对较小，且呈现平稳快速增长趋势。人均

GDP 增长率比第二阶段更高，达 15%；GDP 增长率与第二阶段持平，劳均 GDP 增长率比第二阶段低。从产业结构来看，这一阶段第一产业产值与就业份额分别由 2000 年的 15.1%、50.0% 下降到 2011 年的 10.0%、34.8%，分别下降了 5.1 和 15.2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产值份额变化不大，略有上升且从 2006 年开始又呈现下降趋势，到 2011 年为 46.6%；第二产业就业份额则提高了 7 个百分点，到 2011 年为 29.5%。第三产业产值与就业份额则呈现不断提高态势，在 11 年间分别提高了 4.3 和 8.2 个百分点。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这一阶段，第三产业就业份额一直超过第二产业，并在 2011 年首次超过第一产业，而居于主导地位。整体而言，中国工业化发展到更加成熟和高级化的第三阶段，外部环境更为开放，国内经济发展受国际市场影响更为明显，内部经济结构在破坏性优化过程中不断将结构调整引向深入，经济持续高速而稳定发展，且高速发展潜力巨大。

可见，中国 60 多年来工业化进程符合结构优化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一般规律。在 1952—1976 年政府主导型工业化起步阶段，带有主观和随意性的计划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绝对作用，基本形成了供求结构中重供给轻需求、需求结构中重投资轻消费、城乡结构中重城市轻农村、产业结构中重工业轻服务业、工业内部结构中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化、投资结构中重政府投资轻私人投资、市场结构中重国内市场轻国际市场等非优化的经济结构，当然较之前工业化阶段，这一非优化的经济结构依然具有重要的结构优化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还是极大促进了经济较快增长。在 1976—2000 年体制转轨及工业化加速推进阶段，市场逐步取代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伴随廉价资源及丰富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农民和农业比较收益在提高，城乡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内部重轻结构也趋于合理，农业就业份额严重滞后现象得到缓解，需求摆在更为突出的地位，私人投资日益成为重要的主体。急剧而符合工业化发展一般规律的结构变化是第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释放了巨大的结构红利效应，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而快速的增长。2000 年以来是中国工业化不断步入成熟和高级化发展阶段，低工资的成本优势与强劲外需相结合，让中国制造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焦点。伴随中国制造的崛起，农村劳动力加快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以及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由此缩小了城乡和区域差距。劳动力密集型的外需取代内需成为主要的需求来源，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政府投资在投资主体中重又扮演核心角色，第三产业日益居于主导地位，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在第三阶段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变化既体现优化趋势又存在恶化的因素，这一方面继续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增速的放缓以及进一步结构调整中的巨大结构红利。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事后的观点来看，如果把合意发展速度视为与经济结构优化相一致时的实际经济发展速度，则基于人类历史长河的发展视角，前工业化阶段，因经济结构变化缓慢而导致的合意发展速度也极其低下，人均 GDP 增长率几乎为零。在 1000—1820 年世界 GDP 和人均 GDP 增长率分别为 0.22% 和 0.05%，按照这个速度，GDP 和人均 GDP 分别翻番大致需要 320 年和 1400 年。工业化阶段是一个经济结构快速变化的过程，体现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需求结构和投资结构等方面，因结构变化释放的结构红利效应也非常明显，极大提高了合意增长率。英国和美国在近两个世纪的

快速工业化阶段中，其 GDP 和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达 1%~2%。去工业化阶段时间尚短，经历国家较少，该阶段其传统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投资结构等日趋合理化和稳定化，与更高层次的需求相适应的高水平供给能力或许相对不足，这种供求的不匹配及其不断调适有可能降低合意增长率，并增加了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就中国而言，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952—1976 年为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起步和发展阶段，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快速而扭曲的结构变化提高了合意发展速度，同时也抑制了经济应有的发展潜力。1976—2000 年为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健康而持续的结构优化充分发挥了结构红利效应，极大地提高了合意发展速度，每五到六年人均 GDP 或 GDP 就实现了翻番的目标。2000 年以来为更为开放条件下工业化成熟和高级化发展阶段，低工资的成本优势与强劲外需相结合，刺激了低水平重复投资，在优化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同时，恶化了需求结构和投资结构，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日益依赖投资而消费不足，消费需求中过多依赖外需而内需不足，投资中又过分依赖政府投资而私人投资不足，这一方面提高了合意增长率，另一方面又阻碍了结构红利效应的有效发挥，进一步意味着未来提高合意发展速度的潜力巨大。

总之，不同工业化阶段，或者同一工业化阶段的不同时期，其结构变化有不同的表现和特征，主要体现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两个方面，涵盖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投资结构、需求结构等内容。和谐、优化、持久的结构变化将在根本上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型转变，进而不断提高和巩固合意发展速度。这一研究结论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以来，我国保持着年均 GDP（包括人均 GDP）10% 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但目前许多行业生产严重过剩，同时 2012 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种种迹象表明，基于廉价要素和结构红利的传统高速增长，即将跨入合意增长率下降的结构性减速发展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黯淡，相反，恰恰隐含着未来中国经济结构改革及其提高合意增长率的潜力巨大，只要我们提前采取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

一是促进劳动力跨产业、跨区域流动，发挥劳动力的结构红利效应。建立规范有序、进退自由、鼓励流动的全国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从规范和完善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做起，鼓励农民从农业向城市及农村的非农产业转移，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鼓励劳动力从低效率产业部门向高效率产业部门转移，进一步释放劳动力的结构红利效应。

二是引导合理消费，促进外需向内需的转变，发挥需求结构红利效应。进行旨在发展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增加投融资渠道和方式，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预期支出水平，优化消费环境，引导人们即期合理适度消费；把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牢固建立在内需和消费上。

三是规范政府投资，鼓励私人投资，发挥投资结构红利效应。规范政府投资领域和规模，放开民间投资的政策紧箍咒，避免与民争利；加强政府预算硬约束管理，强化政府投资事后监督和效率评估；不断降低民间投资门槛，扩大民间投资领域，优化民间投资环境，创新民间投资管理，把投资的主体由政府向能瞬息捕捉市场供求关系的私人进行转移。

本研究只是就发展阶段、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速度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抛砖引玉的探讨，重点讨论结构优化利于经济快速发展。反过来，经济发展速度也会影响结构优化；此外，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构优化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在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产业内部结构中还有许多可挖掘的结构红利。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1] Robert M.Solow.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70(1):65-94.
- [2] David Cass. Optimum Growth in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5,32(3):233-240.
- [3] Robert E. Lucas.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42.
- [4] Paul M.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94(5):1002-1037.
- [5] Paul M. 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5):S71-S102.
- [6] Laitner,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0,67: 545-61.
- [7] W.A.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R]. The Manchesester School,may,1954
- [8] Kuznets, Simon.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II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Labor Force[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57, 5 (4) , Supplement, pp. 1-111.
- [9] Chenery, Hollis B., Patterns of Industrial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0,Vol. 50, No.4, pp. 624-654.
- [10] Maddison, A. Growth and Slowdown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Techniques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87,25:649-698.
- [11] Timmer M., A,Szirmai.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sian Manufacturing: the Structural Bonus Hypothesis Examined[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0, 11(4):371-392.
- [12] Hsich Chang-Tai, Peter Klenow.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4):1403-1448.
- [13] World Bank.Annual Report 2012[M].
- [14] Baumol, W. 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57, no. 3 (June): 415-26.
- [15] Krugman, P. Domestic Distortions and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Hypothesis[R]. NBER Working Paper, No. 5473, March, 1996.
- [16] Hersh Adam and Weller Christian. Dose Manufacturing Matter[J]? Challenge, Vol.46. No.2, 2003.
- [17] Nicholas Crafts.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The Economic Journal, 1996, 106(434): 172-183.
- [18] Rowthorn Robert and RamaswamyRamana. Deindustrializatio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R]. IMF Working Paper, April 1997.

- [19] 马洪, 孙尚青. 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20] 杨治. 产业经济学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 [21] 周振华. 增长轴心转告: 中国进入城市化推动型经济增长阶段[J]. 经济研究 1995, (1) .
- [22] 郭克莎. 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M].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1.
- [23] 刘霞辉. 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J]. 经济研究, 2003, (5):
- [24] 陈晓光, 龚六堂. 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J]. 经济学 (季刊), 2005, 4 (3) .
- [25] 陈东升.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的变化[J]. 当代财经, 2011, (2) 11-12.
- [26] 袁志刚, 余宇新.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波动[J]. 学术月刊, 2012, (7): 64-74.
- [27] 马建堂. 营造环境, 力促创新, 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J]. 当代财经, 2013, (1): 9-11.
- [28] 刘志彪, 安同良.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J]. 南京社会科学, 2002, (1): 1-4.
- [29] 周英章, 蒋振声. 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与实际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 2002, (5) .
- [30] 钟学义, 王丽. 产业结构变动同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探讨[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97, (5) .
- [31] 吕铁, 周叔莲. 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 管理世界, 1999, (1) .
- [32] 刘伟, 李绍荣.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 中国工业经济, 2002, (5): 1-8.
- [33] 刘伟, 李绍荣. 地区经济结构差异与平衡发展[J]. 中国工业经济, 2005, (4).
- [34] 巴曙松, 杨现领. 城市化与潜在增长率: 基于长期视角的增长效应评估[J]. 财贸经济, 2011, (3): 96-101.
- [35] 罗斯托. 经济增长的阶段[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36] 布兰查德. 宏观经济学: 第4版[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 [37] 丁溪. 美国经济[M].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6.
- [38] 任保平. 新中国60年工业化的演进及其现代转型[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1): 139-146.
- [39] 骆祖春, 高波. 新中国六十年来工业化发展时段标准的确定[J]. 学海, 2009 (6): 58—63.